

目 录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陆志韦 (1)
司徒雷登年谱·····	刘廷芳 谢景升 (23)
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	(48)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	郑天挺 (85)
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先生 ·····	高平叔 (89)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	冯友兰 (105)
匡互生和立达学园·····	蔡 端 (120)
北京大学感旧录 ·····	周作人 (143)
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回忆 ·····	赵祖康 (185)
抗战时期我参加滇缅公路修建工程的经过 ·····	徐以枋 (228)
乐西公路修建概述·····	郭增望 (242)
抗战胜利后的新疆公路 ·····	刘良湛 (263)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陆 志 韦

“燕大是司徒雷登的燕大”

一九一九年司徒雷登从南京神学院来到北京，筹设燕京大学。从此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初，他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结局下，最后一次离开了中国。在这三十年间，我认为，燕大一直是司徒雷登的学校。燕大的旧人，也许有不喜欢这么说的，因为总觉得自己燕大也有一部分功劳、一部分罪过。所谓旧人，我指的是曾在燕大工作过的中国教职员，特别是那些在一九四八年之后不愿意或是不可能离开父母之邦，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多少经过改造了的人们，不愿意推诿自己的责任。当然，吃了燕大的饭，做了燕大的事，为美帝国主义传播了毒素，有的还变为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些人是有严重责任的，而我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但是我仍然要说，燕大是司徒雷登的燕大，因为他是燕大的组织人、拉纤人、提线人。表面上看来，他在燕大校园住着的时候，偶尔讲讲道，有时骑骑马，主持一些不痛不痒的会议，如是而已，似乎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拿我来说，不记得他对我发过什么命令，提过什么指示，甚至没有暗示过我

不该做什么，或者最好做什么。然而现在回忆起来，我们所做所说的，总的说来，一定是符合他的脾胃的，帮助他完成了文化侵略使命的；否则我也不会在燕大呆得那么久了。梦醒了的燕大旧人当然会认清自己的责任，但是我认为，同时也得记着燕大是司徒雷登的燕大，我们教职员是用优异稳定的生活作为保证而被买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买办。要承认这一点，得经过多少夜晚的思想斗争啊！从前，我常常这么想：燕大也是我的燕大，因为，离开了燕大，我就活不下去了嘛。哪知这一类幻想正是司徒有意要在我们中国人中间造成的。中国人民要想了解燕大是怎样一个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倒也不需要燕大的旧人给大家讲解司徒雷登是怎样的一个人。实际上，要说“燕京生活”是怎样的生活，燕大的“美国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方式，归根到底，都离不了司徒雷登这个人。所以我要首先交代清楚，燕大是司徒的燕大。

至于燕大的美国人，无疑的，是“雷登俱乐部”的中坚分子。美国人口头上也并不说燕大是“司徒大学”，可是“燕大是司徒的燕大”这句话，我还是从一个美国人那里学来的，那是在她气愤的时候说走了嘴。这件事不妨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它可以反映出燕大生活方式的一个镜头。

燕大的预算，非专家看不懂，难处不在于它的七巧板式的拼凑，而在于七雄割据，又时常互相侵犯。只有司徒能挖肉补疮。有一年，经费实在太不济了，司徒命令会计科主任加紧搜刮。会计科主任当然是美国人，当时是一位女士，华姓郭，会计科的中国职员管她叫母老虎。母老虎对一般高等华人也毫不客气。须知道，对华人客气，是不符合司徒的战术的。那一次，她搜刮到

我当主任的那个小系——心理学系，我坚决不答应她挪用有指定收入的实验费。会议上，她说话越说越不象样了，我就申斥她“不要越位胡说”。她一时忘了美国式的“骑士礼貌”，结果倒不错，破口而出：“反正燕大是司徒博士的燕大”。事情是谈不下去了，但心理系的钱还是没有让她挪用。那时我已经是燕大的一位“红人”了，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司徒扶植起来的。那位郭女士后来不知跟司徒和“女部”^①申诉了什么，反正，过了几天，司徒来跟我说，郭女士既然跟我不能共处，只可回美国去。第二学年，她果然回去了，不是例假。又过了一年，听说她又要回来了。司徒特意来跟我说，是“女部”要她回来的，言下之意，既然司徒都管不了，难道我能管得了么？

这一桩事说明了什么呢？燕大虽然是司徒的燕大，但内部可充满着矛盾。据我看来，美国人和高等华人之间的矛盾还是次要的，美国人之间本身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同时中国人之间也有矛盾，这我在下面还要提到。司徒并不想调解或是解除那些矛盾，有时反而故意把它们扩大起来。再则是，这么一桩事在别的教会学校是决不会发生的。别人对所谓面子不会面面顾到。司徒在他的回忆录《中国五十年》里指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爱面子，看来他最欣赏的也正是这种毛病。手腕不那么神通圆滑的美国人，是不会了解司徒怎样通过这一类小纠纷来推动他的“亲善”政策，推销他的“民主个人主义”的。

“内圈”里的中国人

现在燕大的旧人该是谁都认识了，司徒雷登所组织领导的燕

^① 由几个美国女教职员组成的负责管理女生事务的机构。

大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当局者迷，绝大多数燕大的教职员，当时并不能认清这一点。司徒手腕之高，就在于此。燕大存在的三十年，正是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是翻天覆地的三十年。这一代人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意识上有所改变。可是据我回想，从我一九二七年加入燕大以后，并没看到很多的中国教职员在阶级立场上，甚至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有显著的进步。至少我自己一直是昏昏沉沉的，不过心里并不怎么愉快，总觉得燕大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可是又舍不得离开。直到现在，我还以为这种心境不是我个人才有的，也许代表好些好些中国教职员。亲美是真的，但是亲不到“共同体”的程度。司徒雷登以及他所指导的一班美国人，其实也不会让中国人跟他们“亲”到如此程度。中国教职员究竟对司徒这人，对燕大这机构，有什么共同的见解，有哪儿种不同的见解，我不敢试图做任何总结。以下我倒要随便谈谈绝大多数的中国教职员都不认识的问题：燕大是怎样的机构，司徒是怎样的人。

每一个美国留学生，都不会不知道两件事：一是美国国民教育上最基本的训条：“我的祖国，但愿上帝保佑，你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正确也罢，错误也罢，是我的祖国”；二是每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不只是为了宗教，更是为了祖国，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里，不止一处提他一辈子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奋斗。美国人有一种脾气，能在外国人面前批评自己的政府、自己日夜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和“民主政治”。然而内心里另是一回事。在燕大服务的美国人多数是这一流人。当然，也有的不是如此，那他就不会是司徒的得力助手了。

司徒雷登这个人，是燕大的美国人马首是瞻的，可是他们对

司徒也不常是毕恭毕敬，满口颂扬，譬如“女部”的老姑娘们就有人曾对我直说：“司徒博士是没有原则的人。”“没有原则”这个词，在英文中含有“不择手段，背信弃义”的意思，具体来说，可能是指司徒弄钱的手法和内部挪用款项的技巧。甚至最拘谨、最保守的美国人例如高厚德，也曾就某件事谈到他讨厌司徒的作法。一般的中国教职员也许不会听到这样的话，能够听到的只有少数被那些美人或司徒个人所信任和准备吸收加入“内圈”的，其中就有我！

“内圈”的中国人虽然人数不多，可又各有各的企图，各有各的作风。女士们中间有的加入了“女部”的“星期五俱乐部”，男士们有极少数参加了无形的“雷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无形的”，因为它既不是定在星期几聚餐，也不能肯定有若干成员。为什么叫做“雷登俱乐部”呢？因为这些人能用“雷登”来称呼司徒雷登，而不叫他“司徒博士”。这种称呼使一般中国人听来有些肉麻，至少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感觉。因此，虽然我跟美国人和司徒非常亲近，无疑地也是属于“内圈”的人，但从来不称司徒为“雷登”。有一次，司徒直截地跟我提出：“你为什么不要象他们那样叫我‘雷登’呢？”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中国人对长者不那么称呼。”我并不是原则上反对那样叫，只是封建意识和民族习惯使我难以启口罢了。当时口口声声叫“雷登”的，我记得至少有四个人。其中甲跟乙势不两立，而乙又跟丙势不两立。并且每一回冲突都会把我夹在中间。这几个人之中，有一位后来当了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不久死在美国。一位在台湾，一位在美国，一位不知下落。

“内圈”里的中国人，除了可能有个别例外，其余的，与其

说是有意地站稳反动立场，钻进一个外来的反动圈子，还不如说是对于三十年间世界局势的必然发展漠不关心；一方面把燕大当作生活优异的世外桃源，一方面还自负对于所接触到的燕大的中国人多少有点好处。这是一场大梦。司徒在回忆录里最后写的一段话，假若在解放前对中国人言明了，“内圈”里的中国人也早会不寒而栗了（又可能有个别例外）。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狠。司徒说美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统治上；说杜鲁门政府的最大错误是一九四七年对华军事援助既不够多，又不够快；说对中国共产党必须毫不留情地斗争到底。燕大的旧人可以想一想，司徒在校园的时候，那怕是一九四六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么？反动教员在前功尽弃、懊丧恼怒的时候，才给我们补上了一堂课。拿我来说，这比艾奇逊的《白皮书》要辛辣得多。一九五〇年耶稣圣诞，司徒还从华盛顿寄来过一张贺节片，下面写着“你的挚爱的司徒雷登”，虽在中风之后，手迹还是那样妩媚。我给我们单位的书记看了一眼，相视而笑。

上面我想说明的是，燕大是司徒雷登的燕大，但是同时又必须指出，燕大“内圈”的中国人对人民要负很大的责任。要想真正认识燕大，就必须了解这两方面。

“内圈”以外的中国人，也就是燕大的一般教职员工，他们对燕大、对司徒当时的看法怎样，我不太清楚。他们中间，有少数按月领薪三百六十块大洋，住精致洋房，当主任，待遇跟我差不多。也有的人月薪只有十来块钱，住一两间破房，或者住不到学校的房子。书上的知识，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总而言之，他们中有的人应跟我负有差不多同样大的责任，不能尽说不得已而

吃燕京的饭。同时也有少数几位多年的地下党员，更很有一些人比“内圈”更早认识了司徒所摆布的迷魂阵。我说的“内圈”是指我在司徒周围经常遇见的那些人。事实上，“司徒的内圈”可能不止一个，甚至也许并不包含我在本文所指的“内圈”。我始终弄不清司徒的“马戏班”一共有几个“圈子”（象美国人所说的）。一般说来，司徒的赤裸裸的政治阴谋大多不是在校内进行的。

对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剖视

燕大前前后后一共有六七千学生吧，他们是美帝进行文化侵略的直接对象。据我看来，他们的觉悟程度，一般比教员高。勇敢地、不顾一切地走光明大道，或者相当积极地参加历次救亡运动的学生，为数不少，百分比要比教员大得多，那是可以肯定的。详情我实在不了解，所以也不能拿燕大来跟国立大学或是别的教会大学相对比。燕大有一大批学生出身在封建官僚家庭、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其百分比可能比别的大学要高些。他们是带着一定的人生观来到燕大的，又接触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大学呆过多年的人 would 知道，燕大的美国生活方式，毕竟是跟美国不相同的，也不可能相同。这些学生之中，绝大多数现在还在中国，在党的培养之下，已经改造成为相当有用而且积极地为人民服务的人。当然，燕大学生也不全属于这一类家庭出身的，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教会保送或是资助来的，生活比较清苦。而更多的学生则是中小地主或是自由职业者的子女，生活并不怎么富裕，这些人跟美国人来往的机会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因此，亲美崇美的思想也有深有浅，有的对美国教员、对司徒都相当冷漠。不论那一类学生，大多数都读书用功，把繁

重的课程应付过去，希望凭这一点在毕业后有条出路。不过，“毕业就是失业”的问题，在燕大并不严重，因为许多学生家庭都有后盾；而且学校或是司徒个人也会保荐一部分毕业学生出去找到职业。学生在校的时候，研究学术的风气不算浓厚（也许比某些教会大学好些），但是前前后后从燕大门里也迈出去了一些在科学、技术上有相当成就的人，他们现在还在国内的不同岗位上工作着。这一批一批形形色色的学生，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都还没有爬进美国人所念念不忘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圈子里。司徒的意向是恶毒的，手段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成效还是没有能充分发展，只能让他抱恨终身。

让我说一个小故事来结束这一段话。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就发动内战，正当学生饿肚子的时候，美国的救济机关给燕大学生送来好几批营养品。记得最后一批只能发给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只得让他们登记领取，不料登记的人超过百分之八十。于是我拟了一个布告，说：“人家救济我们的东西，不吃也罢了，需要迫切的同学请再登记一次。”结果，第二次登记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九，反倒弄得很麻烦才把这批东西发了出去。

中国化的“美国生活方式”

这里，我想谈谈燕大的“生活方式”。它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么？如果生活方式单指衣食住行之类，且不扯到“民主政治”、“民主个人主义”等等，这跟燕大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相干。在日常生活的范围里，我也只想很简单地先讲一下我所认识的学生们的生活。

上面已经提过，燕大校园里的生活方式，毕竟不可能跟美国

的生活方式相比。燕大学生的饭食相当好。我才到的时候，有机会去学生食堂吃饭，例食之外，可以添一卖炒猪肝、油湖白菜之类，不过如是而已。一些贵公子、阔小姐，时常进城大吃大喝，只可算是例外。反过来说，也有个别的穷学生吃不起饭，不时在食堂拣馒头皮吃。一般说来，燕大的饭食决不超过我五十年前在清华完全免费吃的两汤、四菜、四个碟儿。穿西装的学生相当多，可不是多数。宿舍设备比哪个学校都好，可是一九三七年以后，似乎太挤了。校园里谈情说爱的场面，自然不少。男女学生的比数逐年不同，总是七比三到六比四。环境又是那么平凡而幽雅！没有跳舞会，除了最后的若干年里，有的教员（不全是美国人）开放家庭，让极少学生去参加舞会。我听说，去的人老是那一小撮。还有极少数人，因为受了夏威夷华侨的影响，语言、行动上居然带上了异域风采，譬如弹弹唱唱，这在美国大学也不过是异域风采而已。燕大学生一般讨厌这种风采。

其实，这一切都只是浮面的小节，因为直到现在，人家谈到燕大的“美国生活方式”，老是举一些学生生活上如何浮华、如何洋气的例子，所以我也在这里描写一个大致的轮廓。司徒的功绩假若不过如此，决不会受到马歇尔的青眼。就算校园里的浮华生活再扩大几倍，也不过象有意赔本在中国开个大旅馆，招纳官僚和买办的子女而已。

一九二七年年年初，我带了一家五口投奔燕大，司徒要我们在一个中国式大院子里跟二三十位学生同住。别的教员没有这样做的，我不敢答应。我看他当时有一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他认为美国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有的中国留美学生也许能做到，那就是在一个大家庭式的环境里，用潜移默化、渗透方式来传道。这

“道”也不是上帝、耶稣的道，乃是透过中国人宣扬中国化了的美国生活方式，这里面就包含了“民主个人主义”。司徒和他手下的美国人以至英国人、瑞士人、法国人，他们的传教手法，我看只有一套，那不是个预定的计划，而是随机应变、五花八门地从各个方面把资本主义的人生观渗透到学生的灵魂深处。受感染的人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替他们传道的中国人也会不知其所以然的。除了某几个小型的教会中学之外，燕大的师生关系，比别的教会学校更为亲切一些。学生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说出他跟某个美国教员或是某个高级中国教员有亲密来往。即使自己说不出，或是不肯说，同学们也很容易代他说出。这些学生也不必跟司徒雷登亲身有联系，当然有这种联系的人比我实在知道的要多，但直接挂钩其实是不需要的。这里头没有直接的“道统”，中外货色俱全，愿者上钩。我也不敢说上钩的人全是企图往上爬的，因为有一些人并不需要燕大的提拔，他们在旧社会里自有出路。

要摆开这样一个阵势，司徒雷登得收罗各种各样的人，不能只有一板正经的人，也不能只有嘻嘻哈哈的人；不能只有美国人，上文已经说过了，还须有一大批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成么？司徒未始不愿意这么做，可是有教会的势力牵制他，有基金的条件束缚他，使他无法做到。但是美国人之中，有很不济事的，上面提过的那位郭女士就是一个。她一点也不懂会计，这在燕大并不足为奇，难得是她在燕大那么多年竟然不曾交过一个“朋友”。然而更多的美国人多少有点用处，譬如有一位姓吴的外国教员，他在五十年前就教过我法文，后来流落到燕大来教初年級的德文和法文，在燕大的美国人中间就算是够有学问的了。但是他有更大的贡献，那就是会拉拢一些教会出身的中国学生。美国人在燕大服

务，有的凭科学、技术，有的凭容易跟中国人相处的“品德”，有的凭宗教，有的凭体育，有的可以凭金钱，各个不同。我在燕大差不多二十年，虽然只到解放之后才算认清“司徒公司”对中国人的毒害远远超过美孚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之类，可是对于每一个美国人却早已看透了。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个姓夏的美国教员。他的父亲在美国算得上一个小富翁，把养活儿子的钱交给了教会，然后由教会派遣他儿子来中国。燕大的美国人，在他背后说他是“红”的。一九四八年八月，我偶然得到要逮捕燕大八个学生的黑名单，这位姓夏的教员就让这些学生在他家里躲起来。后来我又跟他商议，让他们在夜间跳墙逃出去。一九五〇年，他忽然要求提前回国渡假，理由是“怕明年回去，就再不能回中国了”。当时我还莫名其妙。那年六月之后，美国挑起了朝鲜战争，我才恍然大悟。这个人可以跟上面提到的一二位相对比，例如那位姓吴的就曾在一九四七年秋天下令关闭校门，不许清华学生来燕大宣传鼓动。

据我看来，燕大学生生活的最大危险在于跟实际生活隔绝，这是司徒有意为他们造了一堵墙，把生活围起来。一个人只是幻想着世外桃源，大毛病不过是消极而自私，可是燕大这世外桃源不是幻想，而是现实。学校四围在动荡着，圈子里却很平安。这不但使人产生幻想，而且变得麻木。别人家吃窝头，孩子叫不出名堂来，回家去嚷着要烤“尖顶有窟窿的蛋糕”吃（实有其事）。人家革命，自己不想革命，甚至害怕革命。上面已经提到好些燕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平凡而优雅的生活环境，再加上繁重的功课、体育、社交，以及相当固定的小集体里的“龙门阵”，使他们优游岁月，四学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也许有人还觉得生活过得丰富

多采呢，象有些毕业生对司徒说的那样。让我往回补充一句话，这种学生生活，特别是女学生的生活，并不是一般美国大学的学生生活。换句话说，燕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正是中国化的美国大学的不革命的生活方式。燕大学生当然有革命的，可实在不能说是多数。也有信革命的，据我估计，为数也不多，而且多半是不成形的。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天，学校还得对付这些人。我凭回忆敢对大多数的燕大旧同学下一个很不客气的判断：他们是在父兄师友的立场上站着、活着，又涂上了一层美国油漆。他们并没有一套反动的“理论”，也没有加入过政治集团，初步改造可能比较容易，但是能否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还得看自己的长期努力了。

以上的一段话，我以为大部分也可以适用在燕大的中国教员身上。跟学生比较，生活上可能只有两点分别：小的一点是，高薪的中国人生活容易趋向浮夸，人家闹欠薪，我们不必；大的一点是，高级知识分子理应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对谁负责，理应想想中国往那儿去。我们该是对青年学生负责的，总不能反过来说，学生要对我们负责的吧。在那个时代，我们跟一些青年人同样糊涂，那就比他们更糊涂一大截儿了。

高薪教员的生活，不可以一概而论，当然不是清苦的。我又只能先说说自己家里的情况。我在燕大足足地领了二十年零六个月的薪金，临走的时候，没有从薪金里留下一个子儿来。家里的一些东西，都不是用薪金买来的。我们夫妻俩都不是会浪费的人，钱并不算少啊，都往哪儿去了呢？可能的解释是这样：带大一帮孩子，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免得美国人说什么：“给了你那么些钱，还是虐待孩子。”这就是一桩大事。家里要弄得整

齐、利落，不能比美国人差。要摆设一点东西，又不能象他们那样往隆福寺去买，否则，“有眼睛”的中国人又会笑话我们。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是自己种植起来的，维持保养更得费钱费力，逢节庆祝，逢事“布施”，拿的钱不能比他们少。为什么老是要讲“我们”、“他们”的呢？就是因为花的是美国的钱。我们知道是受人雇佣的，同时又妄想是在为中国人做事。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不好么？我家的处境。我以为可以代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家庭。有点储蓄、买房置地的人也有些个，多半不是高薪阶层，又多半不是本地人。高薪阶层里（跟我的待遇差不多的），也有个别的人并不象我们那样设想。他们生活要俭朴些，可是美国人，中国人就有说闲话的。譬如，有一个闻名的“抠门的主儿”，人家传说，他家的孩子们面黄肌瘦，因为不给吃饱。有一天，他家的旁院街坊来跟我爱人闲扯，极其尖酸地描述她远远望见那位“主儿”吃饭的样子：“吃三大口饭才撙一点儿菜。”

司徒发明的传教新方式

我们可以从这五光十色的生活背景上来了解燕大的宗教生活，不宜乎反过来，以为燕大是教会大学，就从它的宗教气氛来了解它的社会生活。干脆一句话，宗教在司徒看来，只是附属政治的，只是幌子。他在回忆录里很坦白地说到，年轻时怎样厌恶传教事业。他在校园一年讲两三次道，我也听过几次，觉得他讲不得体，反不如他在圣诞节招待中国儿童时那样胜任愉快。他的另一项宗教任务是每年总有几次为中国人按基督教仪式主持婚礼。一九二一年我来北京成婚，就是由女家安排请他证婚的，还请杜威博士和胡适博士，仪式相当隆重。司徒特别欣赏我，就是

从那时开始的。但是他的“宗教生活”就这样完事了吗？决不是的。在回忆录的倒数第二章里，他忽然变成了一个极度虔诚的基督徒。让我从译本摘录一些话，希望中国基督徒以及燕大的旧同人，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大致明了司徒的宗教和政治两位一体的哲学。

“在我暮年，基督耶稣也象在我童年时一样，能完全使我满足。”（陆按：他在童年时讨厌他父亲的传教生活，耶稣使他满足么？生活不使他满足。）“我的工作完成了；漫长的一天已经过去。我已领到我的工价，在我心中充满百灵鸟的歌声。”（陆按：这是引用亨利的颂赞歌。他的工价是什么呢？杜鲁门一九四七年没有象他期望的那样更疯狂地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他在中国留下什么“业绩”呢？）“除非中国是独立的、统一的、富强的，不再对于任何外国有所惧怕、有所怨怒，太平洋就无法获得稳固的和平！”（陆按：坚决反对承认新中国的是他，缔结中美商约的也是他，那位姓“太平”名“洋”的是谁？）“中国可以成为那个以理智、正义、如国际间善意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之巨大资产，此广大的人类前瞻……会满足青年知识分子的期望，而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国人从历史初期就享有的那种社会民主。”

“一个人对自己国家以外另一个国家所抱的态度所发生的影响，在最后分析下，十之八九，是由于个人交涉的影响。这在中国，比较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因为中国的文化、道德、哲学和伦理标

准，全都立在人类关系之上。”

“我狂热相信：个人的自由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初权利，而且是使我们所寻求的其他利益成为有价值的的一个条件。”

这就够了。他写这些话的时候，该已经认识他的“工价”只不过是精神安慰，但是他至少发现了一件事，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旧式的传教方式已经绝对行不通了，他发明的新方式是通过“个人交游”、“人类关系”、“社会民主”、“自由权利”，把有志气的中国青年纠缠得喘不过气来。他跟我的“人类关系”，也就是“宗教关系”。象我这样的人，在燕大满够基督徒的标准了。即便不是基督徒，也毫无妨碍，只要跟他有“个人交游”，跟一些青年有“个人交游”就可以了。这一点我是早已明白了的。那末，他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宗教的幌子呢？这可不能。燕大虽然由司徒一手筹划，可不是完全没有接受差会^①学校的遗产，并且直到最后，燕大的美国人多数还是差会派来的。没有差会的支持，司徒不能凭个人的声望在美国捐到多少钱，至少在开头的好些年里是这样。

燕大校园里有宗教仪式，有宗教集会，非但有，而且花样多。除了各个教派的基督徒和一些非基督徒共同举行的主日礼拜和每天十五分钟的大学灵修会之外，还有各教派分别召开的小会，例如圣分会、福音聚会、王明道派等等。传教的中心不在宗教学院，而在燕大独创的一种“民主”机构，叫做“基督教团契”（英文原名叫“fellowship”，即“同志会”）。任何教职员、学生、工友，任何能跟燕大拉上一点关系的人，任何教派的基督

^①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

徒，甚至不是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参加”。“契友”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发言权。这个“团契”虽不属于任何教派，可是有自己的牧师，能施洗礼，收教徒。美国人始终抓住这个“团契”作为传教的基地。

常听人说，燕大不是一般的教会大学，至少在二十年代，这话是有道理的。燕大一开办就废除了必修的宗教课。不久，别的教会大学发现这是司徒的远知卓见，对传教有利，于是也逐渐跟着走了，那还是在国民党政府要求教会学校立案之前。燕大首先立案。当时立案的条件有两个，一就是废除必修的宗教课，二是必须有中国校长，由他顶名立案。我记得还要求有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么一来，教会学校名义上变成了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学校。私人办学，向外国朋友捐一点钱，对中国“国体”又有什么损害呢？国民党政府就这样在表面上收回了教育权。燕大第一任校长是吴雷川先生，一位老翰林，做过教育部副部长。那末，司徒雷登变成什么呢？怎么对付美国的差会和有关的基金会呢？他们没有听说过吴雷川其人，也不会信任中国的董事会，尽管其中一开始就有孔祥熙之类的人。不知是谁献的妙计，把“校长”译成Chancellor；司徒改称“校务长”，译成President。美国大学的校长可以称Chancellor，也可以称President。但后者居多。司徒的名义在中文虽然变了，在英文却没有变。美国人根本不理睬什么燕大在政府立了案，有了一位中国校长。

有没有必修的宗教课，立案不立案，都是无关痛痒的事。燕大跟别的教会大学，假若真有分别的话，我看不如举象下面这几样事：第一，我以为也是最重要的，是经费的来源。燕大的收入不外以下几种：（1）最大的一部分靠在美国的永久基金和垄断